



英戈尔德《篮子里的世界》及其讨论

英戈尔德 朱晓阳 徐 菡 袁 哲

摘 要:蒂姆·英戈尔德的《篮子里的世界》通过“篮子编织”这一隐喻,深刻探讨了人类实践、代际传承、知识与生命的动态关系,并批判了现代社会对技术与知识的异化。朱晓阳、徐菡等学者围绕“篮子编织”,就“草墩社会”“民族志电影”等话题展开了对话。

关键词:“篮子里的世界”;草墩社会;民族志电影;英戈尔德

中图分类号:C95/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25)02-0001-10

篮子里的世界

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著 袁哲译 徐菡校订

没有人能永生,最长的草茎、芦苇、稻草也不能无限延长。然而,社会生活还在继续。草的纤维捻成绳可以通过多股线缕的结合无限延长,正如许多生命相结合形成生命的延续,道理是一样的。生命像纤维一样交织在一起,朝向纵深发展。在线缕中,每一股纤维沿着整体的方向相互交织。老的一股即将结束,新的一股随即又加入。当它们相互缠绕,新旧纤维之间产生张力和摩擦力,这样形成的韧性比纤维间的简单叠加更强劲。

类似于村舍与代际间的扭合,这并不牵强,而且很贴切说明了为什么一段被反复讲述的历史被称为记录(record)。在记录中,每个生命保留自己的个性,为何却与其他生命紧紧捆绑在一起?为何随时间的流逝,这种连结不可或缺?绳子打结不仅仅存在于最常见的祖先法规之中,它也运用于时间的度量之中。绳结的积累意味着时间的流逝,而故事会讲下去。

今非昔比。很难说今天为什么不一样了,也很难弄清楚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即使是曾经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捻线和纺纱,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小众的艺术,仅仅可见于业余爱好者和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绳索在日常中不再使用,记录不再是可以讲述和追溯的故事,而是成为各自时代的基准,成为终将打破的局限。然而,代际之间就不会像绳索一样相互缠绕,而是像纸张一样层层堆叠,如同每项工作均在自己的时间内展开。在共同创造当下的过程中,老年人和年轻人远远没能聚拢到一起,他们各安其事,年轻人尚未准备好,老年人就已经离去,失去了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机会。作为“当下”的囚徒,每一代人在“过去”之中一无所获。除了能够在其终生成就的独立传播形式的某些呈现,这就是心

收稿日期:2024-09-19

作者简介:Tim Ingold(蒂姆·英戈尔德),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朱晓阳,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昆明,650031);徐菡,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哲,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昆明,650091)。

特
约
稿



理学家所谓的“社会学习”。与个体学习不同的是,社会学习使习得文化表征的应用成为必要。任何不是经由社会学习所获得的知识都会被遗忘,虽然未来几代人可能会试图从现存的基准中重构实践,但很多东西已经永远地消逝。

就濒临灭绝的技艺而言,篮子编织名列其中。编织篮子就像绳索的扭曲弯折,虽然不是普遍性的结构,但往往类似于社会生活过程的模式。如同织物在他们的手指间穿梭,人们将行为和模式同样的感觉编入他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纪事。每个篮子就像一个小型社区,编织纤维,就如同社区将一个个生命体织入一个柔韧且持久的形式中。正如社区生产篮子,篮子也在再生产社区。在这项工艺实践中,编织篮子塑造了编织者,同时也塑造了自身,相伴而随的是,编织者为编织而建立起来的肌肉记忆、节奏感及成就感。

一旦篮子编织的问题超越了编织本身,扩展到其物质材料的整个生命周期,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篮子被编织出来后会发生什么?这就将涉及土地上的耕作与收获,从草地到柳树丛,还有最终获得的海洋或土地的物产,尽被篮子收纳。更不用说还有所有的关系,无论是祖孙还是师徒的传承,这些关系确保了这门技艺的存续。

于是,篮子编织不仅仅是一种技艺,还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它的传承性在于呈现一整个重要关系的领域,不仅仅是物的关系,也有人及其给养关系,也在尽可能多地不断滋长。在很多创世神话中,世界被构想成一个篮子,这并不足以为奇。这种构想有一种控制感,体现了万物一体的包容性,使得整个世界表里合一。进进出出的编织结构成篮子的表面,同样使其不分内外。而社区也是如此:“社区”一词的本义是“共同给予”,源于拉丁语“com”,意思是“一起”,加上“munitas”,意思是“给予”。它本身并不封闭,而是向他人、过去、未来开放。

然而,制作绳索和篮子的技艺连同绳索和篮子本身即将绝迹。如果它们对编篮子而言只是技术,那倒没什么特别之处。人类历史上的技术正如物种的进化一样,灭绝是常态而非例外,而生命却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进。然而,篮子编织的消失不仅仅是技术的灭绝。当代的独特之处,不是在于生活中的技术损失,而是在于技术对生活的消耗,这一趋势不会轻易逆转。即使再多的自发保存、修复、记录都无法让篮子重获生机。更大的挑战在于代际传承的反思。迎接挑战,意味着设想一个由年轻人和老人能够再次携手共创世界的社会。这对我们看待教育、看待年长者的智慧、年轻人的好奇心以及两代人合作潜力的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

老人的智慧和少年的好奇心均包含着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未来动态的关注,而这两点在这个将客观知识和抽象推理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体系中并没有得到重视。在这样一个价值体系中,由智慧而生的谦逊被认为是思想的贫乏,而由好奇心带来的天真被认为是知识的欠缺。前者被打上衰老的烙印,后者被贴上无知的标签。对于那些负责我们的教育和社会保障的人来说,“老糊涂和无知者可能一起创造未来”,这种想法显然是荒谬的。然而,把智慧和好奇心结合起来不仅是明智的,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可期的未来。这既不是怀旧,也不是追忆往昔,而是希望的根基。

现在,比起编织篮子的实践,没有哪种方式能更好地将智慧和好奇心完美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实践被主流机制严重地贬低,也是为什么要重拾这项技艺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动词:将世界“装篮”(“basket” the world)。我想借此来反对一种普遍的观点:所谓“艺术和手工艺”的正确定位,只是作为学校主干课程的可选补充,而这些主干课程旨在向年轻人的头脑中灌输权威知识,并提高他们的理性逻辑能力。

其中的一门学科就是数学。乍一看,把数学和编织篮子做比较,就如同将一座古典风格



的宏伟宫殿与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屋相提并论。宫殿的居住者是最优秀的人才,而且小屋的居住者或天真或年迈,缺乏智慧,无力改变现状。编篮子所需要的数学计算怎么能够被认为是为了实践而生的降维模仿?是为了便于庸俗的头脑理解而简化的数学?但实际上,宫殿里的居民才受到了蒙蔽,他们误以为数学可以凌驾于现实之上,凌驾于与身体经验相关的重要材料之上。显而易见的是,在折叠、弯曲、编织等手工技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数、线、面、对称、图案,而这些恰恰是小屋居民最为熟悉的。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数学家呢?

例如,任何和材料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交叉的折线不能同时产生,而是需要连续的操作。手和手指必须巧妙地处理材料,先沿一个边折叠,再换另一条边。同样的,篮子需要花时间编织,绳子也要花时间拧结。“编织世界篮子”,就是将事物复原于其正在创造的时间流之中。要知道,没有节奏就没有图案,因为每一种图案都记录形成图案的运动。要想读懂图案,就必须深入地理解动作,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到这里就是记忆的工作了。记忆就是拾回过去的生命,将其融入鲜活的当下,让过去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相结合。回忆某个人,就像在久别之后的重逢,那人又出现在面前,重启我们的对话交流。回忆某种材料,就像感觉到它又回到我们的手中,手不自觉地做出动作,回应手中的材料。这也是编织者在循环往复的工序中所做的事。在“篮子的世界”里,记忆将眼下与往昔之线穿串连起。通过倾听他们的声音、关注他们的需要,我们所要关心的正是将过往的生命带入我们的当下。

然而,当代遗产的产生打破了这种循环。我们不再将过去带入现在,我们背离了过去,只是为了把历史遗产当作传家宝。这样一来,篮子的编织就不再是一种记忆的方式或关注的路径,而是成为一种保存和展出的记忆对象,而不是去引发记忆。它讲述的是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们已抛在身后、不可挽回的世界。就这样,它进入了博物馆——一个旨在为后人保存过去物品的机构。在博物馆里,关于篮子,曾经有一项记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堆记录,其中的每一项都是有待讲述的故事,而现在它变成了一个记录对象。这样的记录出现在历史和考古学官方记载中,每件物品都按制造地点和状态进行分类编目。时间和历史的长河向前流淌,而这件物品被限制在原地止步不前。当然,很多博物馆也在尽己所能抵抗人格物化,努力让馆藏文物返还生命。但是他们面临着双重困境:既要履行将物质文化记录归档的公共职责,又想重振濒临失传的技艺。在博物馆的语境下,这种复兴满载怀旧之情。

事实上,将编织篮子定义为“工艺品”似乎在无形中认定了它的边缘地位,并将其下推,从高层意识推向低层意识,甚至从心智推向身体。这种观念基于根深蒂固的话语,它们认为手工艺的学习和实践为知识和技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渠道,用于补充和平衡被认为是明确的、文字或数字的、抽象的高级推理能力,而手工艺的知识和技能被认为是默会的、非文字的、具身的。然而,我的目的是将课程教学作为“篮子编织”,而不是把篮子编织加入课程教学之中,这是非常不同的——我想要动摇这种互补性所依附的整体平衡。篮子编织不仅仅是制作篮子,还是在创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将一种呼吸生命的方式注入世界,或者说,可以说是一种赋予世界新的生命的方式。我们在算术和文学中赋予数字和文字生命,不是将它们埋没于默会的知识和具身的技能,而是通过生命和感知的洪流来重塑它们,数字和文字既不具体也不抽象,既不是具身的也不是非具身的,它们是生命的、可感的。

首先来看数字,它们源于数数。如今,我们称它们为数据,对其操作称为“数据处理”。一提起这个词,人们就会想到坐在电脑屏幕前操作键盘的科学家、技术人员或业务分析师。他们工作时,屏幕上会冒出大量的数字,这些就是他们的数据。这些数据从某个地方提取而



来,从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加速脱离,为他们服务。虽然他们的手指敲击着键盘,却没有与数据相关的物质材料有实质性地接触。当然,从字面上看,数据本质上是一种给定之物,就像接受礼物时双手接住它一样。不过,如果真的有谁曾经在这种字面意义上处理过数据,那一定是结绳记事的古人,他们从材料的圈数和绳结中读取记录。印加人从他们的编码系统“奇普”中读数,与公共吊索桥拥有相同的原理,“奇普”同样由扭曲的纤维绳索制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制作篮子也是一种数据处理的实践。拾起、穿引、交织,编织者用双手接收着篮子编织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反馈。编织者一边编一边数,一上一下,一遍又一遍,但是她的数字并不相加,它们只是接续地出现,标记时间流逝的节奏。

文字也是如此。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都来自向世界敞开的、充满活力的非自我封闭的身体。它们随呼吸在言语中涌现,随手和指尖的不停运动在书写中流淌。我们常常暗示,语言艺术和手工艺(如编织篮子)汲取的是不同知识宝库的知识,分别是明确的或默会的,无形或具身,高级或低级,或想象、意识。这种暗示是一种错误的比较,因为这是将手工艺实践初始时的蓄势待发与语言文字的精确表达相提并论。但语言文字也有蒙沌的阶段,当在释放之前,会在舌尖或指尖被瞬间感受到。而手工艺的手势,在做出动作时就不再和动作的主体相关了。只看到手工艺的前瞻性初期和文字的回溯性结果,对手工艺和语言文字都不公平。事实上,手工艺者和语言大师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诗人,在蒙沌初始和清晰表达之间,在飞翔和漂浮之间,他们切身感受自己作品的质变瞬间。这就是创造力的源泉,是时间的杰作。

如今,我们担心时间失去了它的节奏,脱离了它原有的轨道,开始不受控制地肆意加速。如果我们能放慢脚步,也许我们就能过上节奏更缓慢、要求更少的简单生活。我们可以走路而不是坐车,可以手写,可以亲手种植我们的食物,等待它们成熟后再收获。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编篮子。对于那些有闲暇时间的人来说,这些选择值得称赞。它们有益健康,环保可持续。真正做起来,既不缓慢也不简单。

编篮子的技艺如此复杂,在过去,学徒们需要多年的辛勤努力才能掌握。在压力下,他们必须动作迅速。如果有人想穿越到过去,想在以前的劳动中寻找悠闲和简单,他恐怕会感到失望。他可能会发现,与今天的舒适条件相比,古人的工作艰苦而永无止尽。然而,他可能也会发现,他对速度和复杂性的现代理解与过去的世界不合适。在过去,快速工作意味着抓住瞬间,而不是争分夺秒;在过去,复杂性在于注意力和反应的深度和敏锐度,而不是冗杂的信息及其整合的规则。

我们的时间穿越者来自一个由算法逻辑规训的世界,而不是由篮子制作技艺主导的世界,两者根本不相容。算法是计算性的,它为解决问题制定了按部就班的程序。机器人的实验表明,这类程序可以通过试错学习逐步改进。可以肯定的是,机器人可以越来越地完成我们人类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设计出可以编织篮子的机器人。这是因为编织篮子不是不变的、计算的而是可变的,并且不断向前的。回想一下,编织者一边数数一边编织,是在使用材料而不是分析材料。编篮子不是一个包含解决方案的问题,而是编织者和材料结合在一起应对只有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此时,关注和回应优于计算和执行。编织篮子不是简单的出入交织,而是能动地结合力与材料,这就是“编织世界篮子”的意义所在。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世界减缓或简化,而是让这个容易被算法分解的世界恢复生命和感知。当我们匆忙逃离这个世界,进入人工智能的泡沫中,将我们最重要的人性抛置脑后之时,我们应该记得,篮子编织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道路。



编篮子，打草墩，废墟建家园

朱晓阳

2023年，英戈尔德(Tim Ingold)教授为在云南大学召开的博物馆人类学会议提交了一篇短文，题为“The World in a Basket”(篮子里的世界)。英戈尔德这篇短文像一段静水流深的河，以编一只篮子为喻，将今日人类学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一一触到，其中有些句子令人印象颇深，例如开头这两段。

没有人能永生，最长的草茎、芦苇、稻草也不能无限延长。然而，社会生活还在继续。草的纤维捻成绳可以通过多股线缕的结合无限延长，正如许多生命相结合形成生命的延续，道理是一样的。生命像纤维一样交织在一起，朝向纵深发展。在线缕中，每一股纤维沿着整体的方向相互交织。老的一股即将结束，新的一股随即又加入。当它们相互缠绕，新旧纤维之间产生张力和摩擦力，这样形成的韧性比纤维间的简单叠加更强劲。

类似于村舍与代际间的扭合，这并不牵强，而且很贴切说明了为什么一段被反复讲述的历史被称为记录(record)。在记录中，为何虽然每个生命保留自己的个性，然而却与其他生命紧紧捆绑在一起？为何随时间的流逝，这种连结不可或缺？绳子打结不仅仅存在于最常见的祖先法规之中，它也运用于时间的度量之中。绳结的积累意味着时间的流逝，而故事会讲下去。

英戈尔德将绳编喻为一个村社共同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这种社会情景连同编织篮子一样，今天在任何社会的很多地方都不再是基本的织体。

今非昔比……绳索在日常中不再使用，记录不再是讲述和追溯的故事，而是成为各自时代的基准，成为终将打破的局限。然而，代际之间就不会像绳索一样相互缠绕，而是像纸张一样层层堆叠，如同每项工作均在自己的时间内展开。在共同创造当下的过程中，老年人和年轻人远远没能聚拢到一起，他们各安其事，年轻人尚未准备好，老年人就已经离去，失去了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机会。作为“当下”的囚徒，每一代人从“过去”之中一无所获。

虽然是有些惋惜，作者在最后忍不住呼唤：

编织篮子不是简单的出入交织，而是能动地结合力与材料，这就是“编织世界篮子”的意义所在。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世界减缓或简化，而是让这个容易被算法分解的世界恢复生命和感知。当我们匆忙逃离这个世界，进入人工智能的泡沫中，将我们最重要的人性抛置脑后之时，我们应该记得，篮子编织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道路。

我赞同这个“篮子编织是另一种可能道路”的呼唤。尤其在当下，我们身处经济下行的时刻，篮子编织更会让我们忍不住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或者用滇中稻作地区传统上的另一种相似编织来比喻，有一种“打草墩”的生活仍然在GDP经济的外面存在。打草墩是一种依赖稻子生产，稻草选择和人手编织的人和物相互合作的实践。打草墩的能手要将草墩打得结实(紧)和端正。好的草墩被人坐来坐去很多年，形状能保持中正不歪，也不会变得松垮。打草墩因此既要有手足配合并用的技巧，也要有气力。但矛盾的是，打草墩是妇女的活计。因此有笑话说某家看中某家女想去托亲，于是先送些稻草去，请某家女帮打几个草墩，试试其手艺和力气如何。草墩是家庭自用品和互惠交换的一种礼物。村里打草墩的能手也是会受到尊重的，在某家新房落成或分家新发，请能手做一桌(8个)草墩是很高的礼遇。今天在滇池沿岸已经没有稻田，稻草无从获得，打草墩已经消失。滇池东岸小村的打草墩能手是前村长马建的最小的姐姐，当年她嫁给村里当卫生兵复员回来的帅小伙，后来的村医。这也算嫁得好的一例。这位医生虽然爱喝酒，医道却有些名气，有人甚至从滇池西岸来找他



治病。当地流传有一则故事,不确定是否说的是这位因酗酒过世的医生。

一个病人远道来看病说:“医生啊,你家(jie)格能保我活?”

医生:“我保你死!”

病人:“哎呀,医生你咋个像这种讲话?”

当你初次看见这个乡村医生给病人配的药,心里会疑问:这么敢配药,会不会吃死了?

现在应当说,这个村医的说话和行医风格很有“草墩社会”范。它们是以“不见外”的口吻编织一种“家人”关系^①。借用社会哲学家许茨的话说,这是“我们世界”。

我在1997年还请马建的姐姐打过8个草墩,当时虽然本村已经不种稻,但还能找到合适的稻草。今天不仅无人会打草墩,本地连稻草也不可能有了。昆明的滇池周边地区在21世纪走上城市化道路,打草墩只是最近二十多年被“消灭”^②的诸多传统技艺之一。只是听说这家的儿媳妇在呈贡一带行医,说是多年给老公公帮忙当助手,久看成医,如今也有了些名气。

最近我们放映一部反思十多年前大拆大建历史的纪录片《滇池东岸》时,有年轻观众向我提问“家园”何在。他的具体问题是:对于流动的人来说,家园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否在问:我们这些乘坐高铁飞跑的人,这些生活在别处的各种“漂”,我们的家园何在?

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不只是对突然遭遇工作和生活刹车的人来说存在,就是对于保持长期惯习工作和生活不变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我虽然在各种场合讨论过家园,甚至写过一本书——《地志与家园》。但此刻我直觉认为“家园”是一个人在不被迫从状态下,泰然自若地从事活动、想象问题的状态和周遭环境。这种状态和环境可能是现象学所称的“切近”,也可能是马克思所称之自由人那样“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③。

我不想像英戈尔德那样,用婉转的隐喻将篮子编织和家园用娓娓动听的语言说出,我愿直白相告: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和地方瞬间停驻,将一个角落,一处废墟,建立成家园。无独有偶在《滇池东岸》拍摄的几年以后(2017年),我们确实看到滇池东岸的人们如何在拆迁的废墟上,扒开砖石,借助任何土壤,开垦菜地。他们的这些举动使我们拍成了《老村》这部纪录片。

今天再次将家园与废墟联系在一起谈,不仅有思想的意义,更有现实的可作性和紧迫性。从思想处说,“废墟”并不像网络百科所写的:“表示建筑物遭受破坏或灾害后变成的荒凉的地方或被破坏的地方上面的垃圾和被破坏物。”(百度百科)“废墟指文明建筑物荒废后的遗迹。”(维基百科)在这里废墟是由过去的文明发展成的一种结果,意味着破坏或失败。从这种文明发展的因果逻辑,废墟不再有用。这是基于其原来的文明目标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发展的因果逻辑,只是废墟所在世界中的某一种关联。废墟实际上意味着另一种,甚至多种生境及生活形式的可能性。例如在木材工业砍伐过后留下的森林废墟上,会有松茸和捡松茸人的生境。多年前我在科尔沁做草场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对于因荒漠化而寸草不生的沙地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淡然。他们说“千年草籽万年鱼”。寸草不生的沙地,一场雨后,低洼处变成水泡,水泡中竟然会有鱼。这些说法表明,从工业和产业角度看的无用之地正是其他生物和地球居民的家园。德国画家基弗的画面经常是废墟:战争的废墟、城市的废墟、工业的废墟等。他对此的解释却是:“破坏是正向,因为它标志着新事物的开始。”我猜测基弗的说法有一些德国辩证法的

① 关于“家人世界”,见朱晓阳:《“家人世界”:滇池沿岸宗教生活的语言形式》,《社会》2023年第6期,第1-25页。

② 参见朱晓阳《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1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味道,似乎破坏中或者说否定中蕴含着建设或肯定。我赞成辩证法是一种有用的思维形式,但它与我们所面对的废墟相距很远。我们面对的,例如“发展废墟”——被拆的村庄,烂尾的楼盘,甚至草丛中的三线建设遗址,并不会辩证地蕴含着一种对立的肯定,甚至也不会有再次被否定后迈向“否定之否定”。我觉得这些废墟提供的机会是一些有间距的生活。它们甚至是直接在废墟上长出,而非否定废墟。再用滇池东岸人废墟种地的一个小例子来说明。我几年前发现小村前村长的废墟菜地里蔬菜长得特别好,问他建筑废墟上的地为何能这样。他说实际上庄稼并不需要如过去所想的那样要平整成良田的地,只要刨开建筑垃圾,有一点生土,水肥到位,就能长出好蔬菜。建筑垃圾例如墙土,因从来没有种过庄稼,是最好的土。再看他的豆荚和芥菜是在旧建筑的水泥间生长,有些瓜则藤蔓布满建筑废墟的砖石,像给它们盖了一层迷彩网罩。这些话和实践,使我意识到废墟上的新世界不需要是对发展文明的辩证否定。它们可以是相依相生,但不是从发展文明内部的否定性生成。

再从现实的可作和急迫说,今天在过去二十多年成为城市化热点的地方,甚至文旅项目热点的地方,“发展废墟”随处可见。勤劳的滇池东岸小村人将拆成废墟,又被拆迁指挥部二次用水泥糊住(试图建烧烤市场)的地面,于缝隙中开垦出菜地,仅仅是废墟变家园的一个小例子而已。在同一个地方的另一例是纪录片《老村》里的村寺庙修复。2017年,这座已经残破,面临倒塌的村寺庙,被村小组长(一个老木匠)带领七八个人用三个多月时间修复。在此之前几年,村小组向区文管所数次提出申请要求修缮这个区级文保,区文管所派人做过测量,报了一个180万元的修缮预算。这个预算远远超出区文保维修费一年的资金(50万元),文管所试图寻找公司来承包,或想打包进入拆迁项目(易地重建)。总之几年下来不了了之,村寺庙在此期间已经快成了废墟。2017年由村小组长和几个村民实施的修缮工程仅花费6万余元。村组长从木料市场买到二手木料,用传统木作技术修复房架,再买瓦、撒(铺)瓦,一一按寺庙原样去做。完工后区文管所领导到现场用十分苛刻的眼光做了一番检查,承认修缮符合文物保护的要求,并承诺给修寺庙的村民报销费用3万元(其中村小组长和联防队的投入不能报销)。但这笔费用被认为没有事前通过申请程序,数年都没有得到报销。村民们的理由是,如果等着区里批示修缮申请,寺庙可能过不了那一年的雨季就完全倒塌了。

修寺庙的例子也表明发展废墟如果遭遇到打草墩和水泥缝中种菜那样的民间力量,其生气焕发并不需要等到下一次所谓大发展的机会再来。

昆明的“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在最近一些年已经成为昆明名片,在很多新打造的古镇和古村遇冷的时期,这里正经历人气兴旺的繁荣。从规划者和开发商的角度,实际上老街项目是一个烂尾工程。这里在10年前有六百余户钉子户,要求自主修缮房屋,后来几经斗争,2016年地方政府同意私人业主可以申请修缮。从此以后由承包此地开发企业垄断了的老街更新被多元主体修缮所打破。但直到今天老街的业主申请和实施修缮房屋者仍不过十余户。计划第三期开发的老街上有不少是废墟状的房子。现在老街的繁荣就是立在废墟上。由昆明老街的状况,我们可以期望在从今以后的一些年,将有可能实现一种废墟上的繁荣。说实在的,能实现这种废墟繁荣不是国家的耻辱,相反是喜大普奔之事。因为这种废墟繁荣是以人民的家园为根。

最近有一种地方政府中流行的说法叫“砸锅卖铁”,意思是“盘活国有资产”^①,个别地方政府甚至还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这些属于“烂锅坏锅”的国有资产中,有不少是拆

^① 范浅蝉:《多地提出“砸锅卖铁”盘活资产 资产处置带动重庆上半年非税收入增长超三成》,《财新网》2024年8月28日, <https://economy.caixin.com/2024-08-28/102230747.html>, 访问时间:2024年9月19日。



迁废墟或烂尾工程。政府的“砸锅卖铁”与本文的废墟家园会有内在关系。政府手里的“破锅烂铁”,转给民间也许就是能带来新生和繁荣的家园。例如滇池东岸过去十多年拆迁未完成,土地上市更未完成的地方比比皆是。这些地方作为破锅烂铁已经通过地方政府的拆迁指挥部,出租给一些商家去建烧烤市场、旧货市场或停车场等等。再有一些边边角角,则被挨近的钉子户们划入自己的地盘,建成微型蔬菜农场。

据我有限的观察,某些地方政府的“破锅”在许多习惯房地产开发式经营的承包商家手里仍然是“烂铁”,仍然是废墟。一个原因是这些“市场”,无论是烧烤还是地摊,仍是前者自身的辩证“否定”。过去是体量巨大的商贸城和住宅小区,现在是大体量的清一色烧烤市场。其结果是最近一年滇池东岸许多新建的烧烤市场基本上都是空置。这种情况就如地产商建起的许多“古镇”“古村”或文旅城一样。现在需要设想的是这些烂铁如何才能到达能折腾、会将烂铁再炼成器物的人手里。一个简单的办法是请有意愿来做任何合法生意或活动、开工坊的人免若干年租金入住。例如滇池东岸的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尤其应当走上这条路。我去年底到访过这个用滇池东岸六6个村庄5705亩土地上建成的“中国第二大国际商贸城”^①,其没落的景象超出我的想象。很具讽刺的是,螺蛳湾商贸城内一片冷清之时,有些人气的地方却是晚间商贸城外的地摊市场。据说许多地摊摊主就是商贸城里的业主。白天主业不赚钱,晚上在楼外搞地摊经济。类似的案例如昆明老街,以上说到老街是当下昆明的一张名片,但老街地区是充满差异的。最繁荣的区域是混杂废墟的文庙直街和文明街,最暗淡的是仿古风格打造的正义坊。正义坊的情景与螺蛳湾商贸城差不多。如果以这篇文章的思路推演,这个正义坊和螺蛳湾商贸城要想有些生气和繁荣,应该做的是成为“废墟”,即如上面出的主意那样,以若干年无租金的代价请进来,让这些地球居民“枭鸣松桂树,狐藏兰菊丛”。滇池东岸的农民在谈论起花费巨资盖起来,却因各种问题闲置不用的楼房时会说:那栋房子只养得耗子。现在我们应当说,养得起老鼠的房子正是“繁荣”。当然这种繁荣不是从发展假设的逻辑衍生的,也不是自身内部辩证否定出现的。这是建筑废墟上长出蔬菜。

影像编织:对民族志电影与感官人类学的启示

徐 菡

世界的篮子,还是篮子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如同一个篮子,编织世界,制造文化。生命源自何方?社会传统文化如何发展延续?自然界的草茎藤蔓无以永生,类似于与人类社会中的个体无以永生一样,然而,当一根根草茎拧成结绳后便可以长存,当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结合拧结在一起,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永生。这成为历史,在人类历史演进中,有着和绳子一样的道理。线代表时间的累积和流动,时间拧成历史,每一个个人鲜活的生活拧结为生命,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不息。生命是什么?生命由不同的个体经验汇聚而成,如同篮子的编织,不同的绳子通过技艺制作了篮子及其篮子的世界。

一、从线到编织的思考

英戈尔德(Tim Ingold)延续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科学技术的批判,强调技艺或是传统技艺

^①《新螺蛳湾将成中国第二大国际商贸城》,《昆明日报》,2008年10月06日, <https://www.ynhouse.com/news/view-20996.html>, 访问时间:2024年9月19日。



的价值和意义。线,代表时间和空间的积累和流动。在每个与线有关的行为和活动中,无论是在旅行中、在制图中、手绘草图中、讲故事中,我们已被模式化的行为和模式所取代,英戈尔德区分为有生命力的和无生命力的,从技艺转向技术,恰恰是重拾从心灵转向机械而消失了的灵韵,他批判的正是生命力的缺失。

编织的概念,源于英戈尔德对线的思考和探索,他发现,在行走、编织、唱歌、讲故事、绘画和书写之间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沿着某种线进行活动。线无处不在,却没有人对线的生产和意义进行探讨。生活沿着某种路径前行,通过这些路径,人们逐渐获得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并通过他们讲述的故事来描述这个世界。生命是由各种各样的生命(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纺织出来的无数条线缕编织而成的一种多样整体。^①在编织的过程中,作者意识到并强调人与物之间的联动与交结,并非人与物的分离,或是身与心的分离,由此而产生的生命力。

笔直的线,从根本上说具有人造的性质,显然是被制造出来而不是生长出来的线,然而,跨越代际流动的生命是知识的形成和传承,是生命的编织,他认为栖居是生命的理想状态,它是从内部参与留下的生活足迹,生命是由不同的生命编织而成的线。他对现代性理性进行反思和批评,栖居的知识成为知识获得的一种方式,这是感官的感知途径。在编织过程中,更多的是由感性认识带来的实践过程,编织的技艺更多的是感性的知识,编织世界意味着由时间创造出的过程,通过技艺将历史过往的经验融入当下。编织篮子是一个认知、感知的过程,也是认识生命的过程,因为生命是可知可感的。

二、民族志电影制作的启示

线分为线缕和痕迹,又包含人为和自然的两类产生,线是时间和空间和记录,英戈尔德谈到各种各样的线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如,文字、乐谱、地图、绘画、编织等。在《线的文化史》和 *Making*^② 中,线在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然而,却忽略对电影制作(filmmaking)的讨论,忽视了影像制作之线。一般情况下,电影制作将按信息存储的物理位置称为线性编辑以及有软件支持的非线性编辑,包括拍摄和剪辑两个具体环节。因此,与编织篮子一样,电影制作(filmmaking)也是一门手工技艺,也是一种编织,影像编辑作为一种视觉的编织方式,里面包括了电影制作者对世界和对象的感性的认知和理解。

实际上,影像编辑处理的是由时间与空间交织而成的点组成的痕迹,这些痕迹形成时间与空间的交汇。通过手拉或画画,痕迹在固体表面上留下持续性运动的持久标记,影像编辑本身便是涵盖了文字、音乐、绘画、叙事、编织为一体的痕迹。影像剪辑如同被编织的线缕,可以被视为一种运动和生长。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人类学的影像编辑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同于生活在原地的地方感,由此产生某种具身和具地的体验。

编织世界就成了一个制造文化的问题,像栖居一样,只要生活还在继续编织就会绵延不绝,我们的生活与彼此以及与我们环境的多种成分不断地、暂时地交织在一起^③。事实上,在我们编织的过程中,我们所经验的世界正在我们周围不断地、无休止地形成。只有我们能够编织,我们才可以制造。栖居是有生命力的,民族志电影也是有生命力的。有结才有编织,打结创造表面,占据空间,留下痕迹,同样地,影像编辑在空间上打上时间的印记,在影片剪辑时,影像的时间与空间交织,组成一条有序连贯的线,确切地说,是现实的时间与空间留

① 蒂姆·英戈尔德:《线的文化史》,张晓佳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第4页。

② Ingold, Tim.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Routledge, 2013.

③ Ingold, Tim. "Work, time and industry." *Time & Society* 4.1 (1995): 5-28.



在影像上的痕迹。英文中的文本(text)和纺织品(textile)同是编织 texere 的派生词,书写、纺织、影像编辑共同具有编织的特征。与书写相同,编织影片如同编织文本,均有相似之处。书写者的笔在纸上移动,留下墨迹;编织者的梭子在经纬之间穿梭,留下织物;截取了现实生活片段的影像,在编辑线上重组,生命在电影的时间和空间中流淌,让人感叹岁月如梭。不得不说,民族志电影同样是对对象生活经验和生命力的感知过程。

三、对感官人类学的启示

英戈尔德对空间、感知的关注使他成为感官人类学中一位重要研究者。感官人类学产生于对文本中心主义与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核心问题是在人类学研究与写作中身体的“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由此开启了人类学研究的视觉转向和感官转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感官民族志以具体田野案例关注生命体。

与大卫·豪斯为代表的感官表征论和文化建构论不同,提姆·英戈尔德从本体论的角度,关心人们的身体参与周遭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感官体验,因此身体是文化存在的基础。英戈尔德通过个人感官体验来探讨感官之间、感官与符号意义之间的关系,他的思想无疑影响了感官民族志。^① 莎拉·平克(Sarah Pink)提出“感官民族志”(Sensory Ethnography),指出感官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关注于身体感,个人主观经验的各种身体感觉,即身体感官分类(category)及其感知方式。她认为,民族志作为参与观察实践的概念,应该包括具身体现、具地体现、感知与具身情感,而不是简单地“参与”和“观察”的混合体。^② 感官民族志超越了以往对“参与观察”的理解,将“参与”作为一种生产多感官和具地体验的认知方式来对待,积极发展书写之外的能够创造亲密感和同感的表征媒介,增强说服力,已成为感官民族志的共识。

电影开启了人们的感官世界。2006 年,由泰勒(Lucien Castaing-Taylor)创建哈佛大学感官民族志实验室(Harvard Sensory Ethnography Lab, HSEL)拍摄了一系列感官民族志电影,如《香草》(Sweetgrass, 2009),《利维坦》(Leviathan, 2012),《雅尔》(Yaar, 2014)等。这些影片的基本拍摄方法是运用 GoPro 运动相机的运动效果,旨在通过视听内容、镜头的特殊处理唤起观众的多感官体验,从具身体验和具地体验,体现“触感视觉”(Haptic Vision),其重要意义在于使得民族志电影从视觉中心主义转向多感官体验。

然而,在英戈尔德的基础上,电影与感官的关系不仅仅是呈现多感官的体验,从人类学的角度,还应该包括多感官对生活经验的呈现和体验。虽然观察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的理念早于感官民族志,我们可以从感官民族志的角度,更容易理解观察电影。观察电影指的是强调以个体经验为主的主体发现及其发现的过程,尝试从文化的内部视角和主体经验出发,以文化深描的方式沉浸于对象的文化中,通过影像视听手段生产人类学知识。可见,感官民族志及其理念与观察电影同出一辙,感官民族志利用电影在视觉和听觉的优势,将观察电影视为一种有效的实践方法,特别是观察电影对长镜头、同期声录音以及深度访谈的运用,也包括通过电影制作对被拍摄对象人物和生活的复杂性的呈现和分析,达到以影像传递拍摄对象的生活经验的目的。

[责任编辑:王健]

^① Ingold, Tim.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routledge, 2021.

^② Pink S. *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 Los Angele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15.



The World in a Basket by Tim Ingold and Its Discussions

INGOLD Tim, ZHU Xiaoyang, XU Han, YUAN Zhe (1)

Abstract : Tim Ingold's *The World in a Basket* employs the metaphor of "basketry" to profoundly explor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practic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knowledge, and life, while criticizing the alie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in modern society. Zhu Xiaoyang and Xu Han and other scholars have engaged in dialogues around the theme of "basketry", discussing topics such as the "stool society" and "ethnographic film".

Key words : The World in a Basket; Stool society; Ethnographic film; Tim Ingold

Study on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 A case study of ethnic communities in Yuli County, Xinjiang

YIN Lun, BULIBULI Aikeremu (11)

Abstract : Based on the inclusiveness and mutual support of ecological culture, the Chinese nation has further consolidated its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promote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and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embodie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nhanced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forging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of Tarim Township Community in Yuli County, Xinjiang, this paper takes the local ethnic embedded community as a specific space to explore the four-fold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cultural identity. In term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dentity, livelihood mode identity, ecological knowledge identity, and ecological concept identity, it analyzes the value, attributes, and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role of ecological cultural identity in enhanc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new era,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nature" must undergo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o form a "conscious"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its combination with the Marxist view of cultural identity,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will become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Ethnic embedded communities;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in Oral Narrative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Dissemin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Maonan Ethnic Group

FENG Zhiming, ZHANG Beier (20)

Abstract : The Maonan ethnic group's oral narratives, including creation myths, stories of deities, and local legends, contain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such as the separ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brother-sister marriage, the great god shooting the sun, the genealogy of thirty-six deities, and the concept of one village and one community. These narratives also reflect the interaction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highlighting shared origins and mutual assistance, and represent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common cultural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se symbols have been forme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e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in Maonan oral narratives are preserved and disseminated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archetypal symbols and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IPs on new media platforms. They have thus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um and cultural resource for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 The Maonan oral narrative;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dissemination

Cultural Approaches to Consolid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Building of Mutual Embedding of Ethnic Groups

GOU Shuang (30)

Abstract :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how to consolid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ithin mutual embedding of ethnic Group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in the present. Consciousness is a process evolving from a state of being to a state of self-awareness. In mutual embedding of ethnic groups regions, people broke through the rigid barriers of traditional ethnic relations through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They sought values and thereby sublimated their sense of community within the natural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four shared" principles. Meanwhile,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isomorphic structure of family and nation, they activated and constructed the subconscious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people. This provides a cultural approach for achieving deep and effective mutual embedding in the new era, thereby further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